



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转型发展研究

徐长乐 朱元秀◎主编

——长三角区域经济
一体化系列丛书——

*A
Research*

on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长三角区域经济
一体化系列丛书

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转型发展研究

主 编◎徐长乐 朱元秀
副主编◎谷人旭 于川江

*A
Research*

on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转型发展研究/徐长乐,朱元秀
主编.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系列丛书)
ISBN 978-7-5432-2243-4

I. ①长… II. ①徐… ②朱… III. ①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转型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299.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9306 号

责任编辑 忻雁翔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系列丛书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转型发展研究
徐长乐 朱元秀 主编
谷人旭 于川江 副主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
插 页 4
字 数 323,000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243-4/F·631
定 价 56.00 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理论综述

第 1 章 城市群转型发展研究综述	3
1.1 相关概念界定及辨析	4
1.2 国外关于经济转型发展的研究综述	19
1.3 国内对经济转型和转型发展的研究综述	21
第 2 章 城市群转型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	30
2.1 地理学相关理论	30
2.2 经济学相关理论	37
2.3 社会学相关理论	49
2.4 述评与启示	52

第二部分 实证研究

第 3 章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59
3.1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60
3.2 “十二五”期间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79
第 4 章 长三角城市群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86
4.1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判断	86
4.2 长三角转型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91
4.3 长三角城市群率先转型发展的意义	94
第 5 章 长三角城市群转型发展的制约因素	99
5.1 经济增长效率有待提高	99
5.2 体制机制一体化有待创新	105
5.3 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有待加快	107

5.4	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增强	115
5.5	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有待优化	125
第6章	长三角城市群转型发展思路及其对上海的影响	134
6.1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创新驱动、结构调整、协调发展	134
6.2	产业结构转型: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空间布局优化	142
6.3	区域城乡结构转型:城市功能完善、城乡协调发展	152
6.4	社会转型:重视民生福祉,创新社会管理	158
6.5	政府转型:行政体制改革、公共服务型政府	164
6.6	温州金融改革及其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影响	167
第7章	上海引领和应对长三角城市群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175
7.1	“一个目标”: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176
7.2	两大平台: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国际经贸投资服务平台	177
7.3	“三项共建”:共建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中心、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182
7.4	“四点突破”:功能塑造、结构调整、自主创新、体制改革	191

第三部分 专题分析

第8章	上海转型发展中的政府—企业—科研联动模式创新	207
8.1	上海转型发展的国内外背景	207
8.2	上海发展中的政府—企业—科研现状分析	212
8.3	上海不同发展阶段政府—企业—科研联动类型	217
8.4	国内外“智库”案例及其借鉴启示	224
8.5	上海转型发展中的政府—企业—科研联动发展模式构想	228
8.6	推进上海政府—企业—科研联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234
第9章	以加快临港新城开发为突破口,带动上海滨海产业发展	239
9.1	临港新城产业与人口发展背景	239
9.2	临港新城滨海产业的发展	242
9.3	临港新城人口与就业的主要途径	245
9.4	临港新城开发带动滨海产业发展的总体设想	248
9.5	临港新城开发带动滨海产业发展一体化路径	251

第 10 章 上海海洋科技创新服务长三角研究	255
10.1 上海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 SWOT 分析	255
10.2 上海海洋科技竞争力测定——基于与沿海省市的比较	272
10.3 完善上海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升上海海洋科技竞争力	284
10.4 上海海洋科技创新服务长三角的途径与措施	287

第一部分

理论综述

第1章 城市群转型发展研究综述

1978年,我国开始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程。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和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与此同时也积累了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生态、社会协调等诸多深层次问题,面临着再一次的改革与转型。可以说,当前我国正经历的这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新的全面转型,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型发展的攻坚时期。

在全国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城市群作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和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面临的转型任务更加艰巨。由于城市群内城市密集,城市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的程度明显加大,城市群自身的集约和高效功能依赖于城市群的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区经济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群在发展中往往忽视了城市群内部的统筹发展,城市功能趋同,城市与城市各自为政,产业分工不合理,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等等。同时,城市群不断极化的趋势使城市群自身的生态和环境面临巨大压力,其可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转型”已经成为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城市群发展的主线。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上述问题更加突出,面临着率先完成转型、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使命。后危机时代,面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长三角城市群要想继续引领全国经济发展、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转型升级的任务刻不容缓。

自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转型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对转型内涵的认识一直在不断深化,转型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也在逐步深化和拓展,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1.1 相关概念界定及辨析

1.1.1 城市群、都市圈与大都市区

在国内学术界提起城市群,必然涉及一组与城市群相类似的概念,如大都市区、都市圈、都市带等。这些概念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些概念的描述和使用比较混乱,因此需要加以辨析和界定。

1. 国外相关概念

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region)的概念源于美国。早在1949年,美国预算局就提出了大都市区的概念和界定标准,而在之后的五六十年里,多次对大都市区的概念进行了修订。虽然在界定标准方面前后有较大变化,但是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并且在核心内容方面没有太大变动。200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概念更新为“包括一个可识别的人口核心和具有核心的高度一体化的毗邻地域的地区”。^①

其他西方国家也有与美国大都市区相类似的概念。如加拿大的“国情调查大都市区”(Census Metropolitan Area, CMA)、德国的“城市区域”(Stadtregion)、英国的“标准大都市劳动市场”(Standard Metropolitan Labor Area, SMLA)、澳大利亚的“国情调查扩展城市区”(CEUD)、瑞典的“劳动—市场区”等(许学强,1997)。西方国家对大都市区的定义,虽然彼此之间在表述和界定标准上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概念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经济中心、经济腹地及中心与腹地之间的经济联系,而这正是功能区域的三个重要特征。因此,从本质上说,大都市区是功能区域的一种形式(洪世键,2009),是城市发展到较高阶段产生的城市空间组织形成(谢守红,2004),是一个由大的城市人口核心以及与其有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临接地域组合而成的功能区域,它通常不是一级行政单位,而是城市功能上的一种统计单元(周一星,1995)。

日本也曾参照美国的经验,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如1954年提出了“标准城市区域”的概念,但是后来这一概念逐渐被放弃,城市功能区域被具体化为各种“城市圈”。在空间范围上,都市圈包含多种地域尺度,其中最重要的两

^① U. 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Standards for Defining Metropolitan and Mic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Notice. <http://whitehouse.gov/omb/fedreg/metroareas122700.pdf>.

种形式是:(1)以单一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日常都市圈”(简称为“都市圈”),它是以当日往返通勤范围为主形成的日常生活、生产都市圈。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提出的都市圈概念即为日常都市圈,其界定标准为:以一日为周期、可以接受中心城市某一方面功能服务的地域范围,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须在10万以上。(2)以多个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多核心都市圈”(简称为“大都市圈”),它是由以若干中心城市为核心和周边城市、地区所共同组成的更大的地域经济结构,其内部通常包含若干个“日常都市圈”。如1960年日本提出的“大都市圈”的概念,规定大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为中央指定市(相当于中国的直辖市),或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并且临近有50万人以上的城市,外围地区到中心城市的通勤率不小于本身人口的15%,大都市圈之间物资运输量不得超过总运输量的25%(张京祥等,2001)。无论是日常都市圈还是大都市圈,都是城市通过对其周边地域辐射职能而发展,以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功能地域、节点地域,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上的地域构造,而且是一种具有功能的社会实体(陶希东,2004)。可见,日本的都市圈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大都市区概念,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功能区域,只是在具体的界定上,日本的大都市圈突破了美国大都市区的地域范围,其直径可达300公里,人口可达1000万以上(谢守红,2004)。

大都市带(megalopolis),也称大都市连绵区,是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1957年首次提出的。戈特曼将大都市带概括为由许多都市区连成一体,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活动存在密切交互作用的巨大城市地域(Gottman, 1957)。可见,大都市带是一个比大都市圈(区)范围更广的区域。但是戈特曼提出的“大都市带”是一个模糊的空间形态,他也未对此作出明确的定义。不过,学术界对其认识在内涵上基本一致,认为大都市带是由若干大都市区构成的巨大城市地域复合体,而大都市区是构成大都市带的基本地域单元。

2. 国内相关概念

我国学者对城市群等现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在引入西方的学术概念时,不同的学者在译法和表述上存在差异,同时不少学者又创新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相关概念,再加上由于国内缺少权威部门的官方界定,致使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都市区、都市圈和城市群等概念的描述和使用比较混乱。就“megalopolis”一词来说,在国内就有多种翻译,如大都市带:周一星(1995, 1997, 2000)、张京祥(2000)、王兴平(2002);大都市连绵带:顾超林(1999);城市连绵区:姚士谋(2001);都市圈:郭熙保等(2006);大都市区

(城市群):谢让志(2004)、冯珏(2006);大城市群:周牧之(2003),等等。

(1) 都市区。周一星(1986)认为,都市区是与中心城市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以非农业经济为主的县域单元间的组合,属于城市的功能地域概念。崔功豪(2001)指出,都市区是指大城市的空间范围或影响范围在客观上形成的、由中心城市及周边城镇构成的具有城乡一体的城市化地区,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空间单元。宁越敏(2003)提出大都市区城市功能区的概念,它由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中心城市和周边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县域组成,中心城市是核心区,周边县域是边缘区。胡序威(2003)指出,都市圈的概念可以超越市区界,是一个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由外围与其联系密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县市共同组成的区域,内含众多城镇和大片半城市化或城乡一体化的地域;如果其中中心城市是一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可以称之为大都市区,如果有两三个相互临近的大中城市作为中心也可共同组合成为一个大都市区;总之,大都市区往往是跨城市行政区的区域联合。虽然目前学者们对(大)都市区的论述各异,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是在本质上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大都市区主要由中心城市以及周边县域组成,中心与外围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大都市区属于城市的功能地域概念。

(2) 都市圈和城市群。对都市圈的概念,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沈立人(1993)认为,都市圈是以大都市为核心,超越原来边界而延伸到邻近地区,不断强化相互的经济联系,最后形成有机组合甚至一体化的大区域,又称大都市地区或大都市连绵区。张京祥(2001)认为,都市圈是指一个或多个核心城镇,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临接城镇与地区组成的圈层式结构,主要包括以单一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日常都市圈”(简称为“都市圈”)和以若干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多核心都市圈”(简称为“大都市圈”);高汝熹等(2006)认为,都市圈是指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以发达的交通通信网络为基础,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主导,通过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间以频繁的人员流、资本流和信息流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联系,最终形成的经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另外,高汝熹(1990)早期提出的城市经济圈的概念也基本等同于都市圈。

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城市群》一书中,姚士谋和陈振光(1992)提出用“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来描述中国的城市密集地区。随后,关于城市群的概念,也有一些不同描述。但是目前其中最权威、最流行的仍是姚士谋所给的定义。经多次修订后,姚士谋(2006)认为,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

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但他对城市群没有提出明确的人口规模标准,致使在研究各城市群的人口规模时出现不同口径。

从以上综述可知,“都市圈”和“城市群”这两个概念在国内经常被混用,概念表述也比较类似,有时也与大都市区混淆。刘君德等(2004)认为,都市圈的概念比较灵活,其规模可大可小,既可以是“日常—生产都市圈”,也可以是多核心的“大都市圈”,在本质内涵上是与都市区、城市群等一致的(刘君德、马祖琦,2003)。可见,都市圈地域范围伸缩性较大,日常都市圈通勤范围较小,“一小时距离法则”对其地域范围有明显制约作用;大都市圈城市之间的距离一般在300公里以上(王建,1997;徐琴,2002);城市群的直径距离一般在200—300公里(姚士谋,1992)。

(3) (大)都市带。我国对都市带的研究,在概念上相对比较一致,主要以“都市连绵区”为主。宁越敏、于洪俊(1983)首次以“巨大都市带”的译名将戈特曼思想引入中国,认为巨大城市带的主要特征是具有世界最大的城市现象、政治经济上的中枢作用、超级城市和国际港口的核心作用。史育龙、周一星(1997)则认为与戈特曼“megapolis”相对应的中国概念是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MIR),认为大都市带或都市连绵区就是以都市区为基本组成单元,以若干大城市为核心并与周围地区保持强烈的交互作用和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沿一条或多条交通走廊分布的巨型城乡一体化区域,并提出形成大都市连绵区需要具备五个必要条件。“都市连绵区”的概念提出后很快被中国城市地理学家所接受。宁越敏等(1998)也认同了周一星的“都市连绵区”的表述,提出先采用周一星关于都市区外围县域的界定标准确定中心城市及其相关外围县域,然后将由首尾相连的都市区组成的县市界定为都市连绵区,未相连的都市区和未达到标准的县市不属于都市连绵区。另外,顾朝林(2001)、诸大建(2003)、胡序威(2003)也都曾表述和定义过都市连绵区(带)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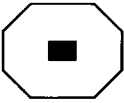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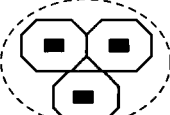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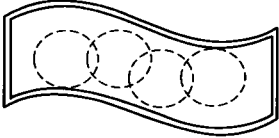
3. 概念辨析

从以上分析可知,国内对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都市带、都市连绵区等相关概念在理解上的主要差异表现在空间地域范围和演化发展阶段上,产生这些概念上的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官方对这些概念的权威界定。抛

开这些概念之间在空间地域范围和发展阶段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出,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都市带等是城市化不同阶段出现的空间类型,在本质上都是功能区域,具有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和一定范围的经济腹地,中心城市和腹地之间有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

不过通过梳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些概念代表城市化不同阶段出现的空间类型,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关系,在地域范围、规模、空间结构等方面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表 1.1)。我们认为,在区域空间序列上,存在这样的演化发展过程:一般城市——(大)都市区——(大)都市圈——城市群——大都市带(都市连绵区)。城市群是都市带和都市连绵区的低级形态或基础,当城市群逐渐发展到一定阶段,则演变为大都市带或都市连绵区。

表 1.1 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和都市带的区别与联系

相关概念	都市区 日常都市圈	城市群 大都市圈	大都市带 都市连绵区
城市地域结构	单中心	单核心或多核心	多核心
形成主导力量	集聚和扩散并举	集聚和扩散并举,近域横向扩散明显	以扩散为主
形成阶段	中高级阶段	高级阶段	成熟阶段
逻辑关系	大都市圈的组成单元	两个或两个以上大都市区(日常都市圈)的集合体;大都市带的组成单元	大都市圈的有机聚合整体
组织管理特征	一般不跨省市行政界限,便于协调管理	跨省级或地级行政界限,协调难度大	跨域数个大都市圈范围,横向分工与合作,需要国家调控
示意图	 点状	 面状	 线状

资料来源:陶希东,2004。

4. 本书对城市群的理解

在城市群的概念表述上,笔者认同上述姚士谋所给的定义,并认为城市群与都市圈在本质上没有根本的区别。本书所研究的长三角城市群,其范围

也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包括江苏的扬州、泰州、南通、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的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台州,共16个城市。笔者认为,对城市群的本质以及我国城市群的发展,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

首先,城市群并不是多个城市的简单集聚,它强调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及相互影响,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城市功能区域,在于淡化行政区划,强化中心与其腹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协调区域经济关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其次,城市群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现象,能够产生巨大的集聚经济效益,成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成为众多国家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手段。

第三,发育成熟的城市群可以极大地提高经济、社会约集化程度,从根本上提高能源、资源的集约化利用率,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同时由于城市群强大的辐射功能,使得城市群成为未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引擎和核心区域。

第四,城市群正在成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的地域单元。作为我国实力最强的长三角城市群,肩负着该项重要使命。但是长三角城市群当前的综合实力仍有待提高,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

1.1.2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

1.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最早研究的问题之一,也历来是经济学家关心的话题。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发展主要立足于经济层面,因此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同义词。“增长”和“发展”作为描述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专门概念,常常被交替使用、互相替代。如埃尔沃斯(1950)认为“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出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奥肯和理查森(1962)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定义为物质福利持续而长期的改善……反映出产品和劳务流量的增加”。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发展文献中,对发展含义的解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并开始把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汉斯·辛格(1965)在一篇论文中明确地指出:“不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增长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发展是增长加变化,而变化不单在经济上,而且还在社会和文化上,不单在数量上,而且还在质量上。”之后,经济学开始把

二者区别开来,一些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产出的增加,并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将经济发展定义为结构的改变,并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比如,谭崇台(1992)曾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展中国家须在经济持续而稳定增长的基础上谋求经济全面而协调地发展。发达国家已越过不发展阶段,所关心的是保持经济的继续增长。因此,对发展问题的论证一般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对经济增长问题分析的背景一般是发达国家。”吉利斯等(1998)、陶文达(1995)和郭熙保(2000)等都有过类似的想法。

关于“经济增长”的含义,西方经济学一般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产出和劳务供给量的增加(包括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和更高的生产效率所带来的产品的增加),它既包括经济总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的增加,又包括人均产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偏重于数量的概念。目前权威的定义是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98)提出的:“国家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能力的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调整的基础上的”。

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复杂得多,内容更丰富,主流文献普遍认为,除了产出增加以外,经济发展还要包括结构的变化。不过在对“结构变化”的理解上,主流经济学家之间出现了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看法。

吉利斯等(1998)认为,“经济发展,除了人均收入的提高外,还应该含有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在国民产值中随着农业比重下降的工业比重的上升,以及居民在城市人口中的百分比的上升。此外,进入发展阶段的国家,通常要经历人口加速增长然后减速的过程。在这一期间,该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会发生极明显的变化;消费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人们不再把全部收入花在购买必需品上,而是逐步转向购买耐用消费品,最终转向休闲品和服务的消费”。熊彼特(2000)定义的经济发展又被称作“创新”,它是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自发的”“非连续的”“结构的”变化。钱纳里等(1988, 1995)也持有类似的看法。

谭崇台(1992)指出,“经济发展是指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发生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第一,投入结构的变化,即生产中投入要素比例的变化;第二,产出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产出结构的变化;第三,一般生活水平和分配状况的变化;第四,卫生健康状况的变化;第五,文化教育状况的变

化;第六,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变化”。陶文达(1995)认为“‘经济发展’则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经济增长,即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长,还意味着随着产出增加而出现的产出与收入结构上的变化,以及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的变化”。周天勇(2001)、苏东水(2001)等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可见,在对“结构变化”的理解上,主流观点内部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结构变化”外延的界定上。其中,吉利斯、钱纳里等所理解的“结构变化”的范围较窄,他们将结构变化理解为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包括工业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城市化和消费结构变化。与之相比,谭崇台和陶文达对结构变化的理解要宽泛许多,除了经济结构变化以外,他们认为还应包含社会结构的变化。

但是,任何关于经济学的著作或教科书都并没有讨论社会结构的变化,就连采用宽泛概念的谭崇台和陶文达所编写的教科书也是如此。再有,笔者以为,将社会结构变化理解为“发展”,而非“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似乎更为妥当一些。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上述关于经济结构理解上的差别并无实质性的意义。可见,在主流经济学文献中,结构变化基本上就是指经济结构变化,指伴随着产出增加出现的工业化、城市化。

可见,经济增长主要是对不同时期投入变化导致产出数量的增加而言,包括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和更高的生产效率所带来的产品的增加,偏重于数量的概念;经济发展则表现为在人均产出增加的同时,还伴随着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代表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发展在内涵上比经济发展更加宽泛,必须包含各个社会主要追求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价值。古莱特(Goulet, 1971)对发展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他从很广泛的角度定义发展,并且指出了发展的三种基本要素和核心价值,即生存(life-sustenance)、自尊(self-esteem)和自由(freedom)。

实际上,由于经济发展或发展的内涵不断深化,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着经济发展问题,而发展中国家也有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困惑,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很难再被割裂开来。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过程,更是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进程,以及人口素质、生产质量、环境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如果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就会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调和重大损失。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经济增长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